

《两骑士》的后殖民主题解读

王 苹, 张建颖, 姚旦墅

(南京审计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 乔伊斯认为《两骑士》是《都柏林人》中最好的故事之一,它揭露了爱尔兰社会的堕落。但该小说还未被充分认识。运用葛兰西霸权理论和法农及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论剖析该小说,从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属下阶层三个层面,可以揭示英国殖民者是如何通过“政治高压”和“主动赞同”来维护权力统治的。研究表明,殖民者的价值观变成全民共识,这种文化诱使被统治的爱尔兰人认同殖民者,有助于维护殖民统治地位而不是反抗压迫。

[关键词] 乔伊斯;《两骑士》;后殖民理论;葛兰西霸权理论;《都柏林人》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750(2012)03-0103-07

国内乔伊斯短篇小说《两骑士》历来被评论界忽视,至今在中国期刊网上没有一篇研究文章。笔者曾在《民族精神史的书写:乔伊斯与鲁迅短篇小说比较论》一书里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了《两骑士》与《高老夫子》的异同,但限于篇幅和视角,没有做深入探讨。乔伊斯在写给出版商的信中盛赞《两骑士》:“这是本书的重要故事之一。我愿意牺牲其他五个故事来换取这个故事。我喜欢这个故事仅次于《纪念日》。”^[1]并且,因为他拒绝修改其中的细节而部分地导致《都柏林人》的推迟发行。《两骑士》小说最后扩展成《尤里西斯》,莱内汉变形为布卢姆,科利变形为鲍伊兰,女仆变形为莫莉。因此,其重要意义值得深究。

《悲惨的大地》中法农说殖民社会结构基本上是曼尼基式(Manichean)的二元对立,好与坏、黑与白、统治与被统治等等截然分开。但是福柯在《性史》中认为,权力并不是从上到下,权力没有中心。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巴巴在《文化定位》中也指出曼尼基关系并非决然对立,相反,在建构过程中,对立的二元以互相依赖、互相迎合、互相演出的方式存在于不断流动的殖民权力网络中。本文拟用葛兰西霸权理论、法农及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论解读《两骑士》的主题,从上层政治社会、中层市民社会和下层属下社会阶层三个层面揭示英国殖民政策对爱尔兰社会的破坏,从而挖掘出小说的深意。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狱中札记》中指出,整体国家(integral state)是由“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加上“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所构成的。“政治社会”代表国家的正式组织系统,即法庭、警察、监狱、军队等社会强制暴力机构;“市民社会”指非正式的、非暴力的、民间的种种组织结构系统和精神力量,以及直接、间接影响政治的各种辅助力量,是统治阶级使用舆论、道德伦理等意识形态机器所进行的柔性控制。帝国主义通过文化霸权作用,塑造了殖民地人们对社会现实(如阶级结构、性别划分、种族结构)的共识,在潜移默化之中使他们认可当下的社会现实状况,使殖民统治合法化。

[收稿日期] 2012-01-06

[基金项目] 南京审计学院基金项目(NSK2009/B29)

[作者简介] 王苹(1967—),女,安徽六安人,南京审计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张建颖(1958—),女,浙江黄岩人,南京审计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姚旦墅(1958—),女,江苏东海人,南京审计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

小说的标题“Two Gallants”具有多义性,囊括了几项重要的主题:第一,爱尔兰语中“gall”指“外国人”,英语中该词指“海军旗帜和部队军人”,这暗合了科利“假英国人”的身份。科利是爱尔兰人,却投靠殖民警察,狐假虎威,坑蒙拐骗,是编外的部队军人。第二,“gallant”来自古法语“galer”,“作乐”之意,暗合了代表本土中产阶级莱内汉对殖民宗主国中产阶级的认同,还指“勇敢、侠义、多情”,这与科利骗取姑娘钱财与爱情构成反讽^{[2]52}。第三,“gallant”还是古高地德语“水性杨花”的派生词,暗指以女仆为主要代表的爱尔兰属下阶层。英国对爱尔兰几百年的殖民使爱尔兰人丧失了民族自尊心,乐意成为任何殖民主子剥削和统治的对象。“这个故事是研究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背叛。”^[3] Day的判断很有道理:“科利代表傲慢的英国征服者,莱内汉代表支持叛徒的爱尔兰人,被科利骗取金币的女仆代表毁坏的爱尔兰。”^[4]

一、上层政治社会的暴力高压

葛兰西说现代社会“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冑的领导权”^{[5]222}。“政治社会”以外在有形的惩罚胁迫,建构一种权力机制,迫使人民认同及内化国家所宣扬的道德、伦理、价值及信仰^[6]。小说首先揭示了英国殖民者通过“政治社会”的暴力统治,收买、培训了一批帝国的鹰犬,对他们进行“英国化”(Anglicization)规训的真相。科利就是“政治社会”的工具,是殖民代理人,是高压暴力的上层政治社会的代表。

小说开头一段用重复、头韵技巧描写了都柏林人懒散停滞、拒绝变化的状态:

“The grey warm evening of August had descended upon the city, and a mild warm air, a memory of summer, circulated in the streets. The streets, shuttered for the repose of Sunday, swarmed with a gaily colored crowd. Like illumined pearls the lamps shone from the summits of their tall poles upon the living texture below, which, changing shape and hue unceasingly, sent up into the warm grey evening air an unchanging, unceasing murmur.”^[7]

“温暖的”(warm)、“灰色的”(grey)多次重复,奠定了故事的背景和基调。“circulated”既有“散布、弥漫”之意,还有“循环”的意思,而两个青年正是沿着“南循环路”作了一个邪恶的循环。故事发生在星期天黄昏,笃信宗教的爱尔兰人应该在教堂做礼拜,而这些人却在进行金钱和肉体的交易,骗来的金币对应着犹太出卖耶稣的银钱,为了自己的利益背叛了爱、人性和国家。

科利是英国化的产物,是典型的“假英国人”(shoneens)或西不列颠人(West Britons),“模仿英国生活、习惯、风俗”,同时“誓志效忠英国”^[8]。《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 1560)规定了教会和政府官员在担任公职前应宣读的誓词。法案的出台培养了大批像科利的爱尔兰人:内化殖民主文化价值,瞧不起自己的祖国和同胞,以殖民代理人的身份自居,以附庸欧洲大陆时尚为荣。《都柏林人》中有一系列这样的人:《车赛之后》的吉米父子,《一朵浮云》里的加拉赫,《死者》中的加布里埃尔等人。科利是巡警之子,姓氏表明他是一个盎格鲁化了的爱尔兰人。受到父亲影响,科利不但背弃爱尔兰民族意识,而且直接以“自愿的奴隶”(willing slave)身份,与镇压民族主义运动的英军及迫害反殖民运动革命英雄的监狱警察合作。他追逐个人名利,背叛民族主义理想,成为反民族的(anti-national)殖民共犯^{[9]150}。他巴结奉承殖民警察,经常与他们称兄道弟。为了几个赏钱,他常常告密,“人们不时看见他和便衣警察一起走,谈得挺亲热。他知道好多内幕新闻,并且喜欢下结论”^{[10]①}。

英国在《刑法典》(Penal Laws, Ireland)里鼓励爱尔兰人告密,规定揭发秘密潜伏的高级教长可获赏金 50 英镑,捕获一名托钵僧或未登记的教士可获得 20 英镑,逮捕一名学者(School Master)可获 10 英镑的赏金^[11]。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说该法典使人民受压迫、穷困、堕落,丧失做人的本性,失去民族认同^[12]。科利就是该法典的产品。都柏林“是英国部署警察最多的城市,有都柏林市警

①本文中《两骑士》汉语译本节选自孙梁等人所译的《都柏林人》并有所改动。

察局和爱尔兰皇家警察队巡视全爱尔兰,都受都柏林城堡管辖。Morely 爵士称都柏林城堡是‘为统治对抗其意志的国家发明的最好机器’”^[13]。《都柏林人》中不少人都在警署供职,协助英国人统治爱尔兰。《圣恩》里的鲍尔先生供职于都柏林堡皇家爱尔兰警察总署;《纪念日,在委员会办公室里》里的汉基说不少人为城堡工作,“为了四便士就会卖国……哼……还要卑躬屈膝,感谢万能的基督,让他有个国家可以出卖哪!”科利就是其中之一。作者用漫画式手法勾勒出科利的长相,揭示其流氓本质:

他走起路来双手紧贴两侧,昂首阔步,头摇来摆去。他的头极大,滚圆,油光光的,一年四季满头大汗。那顶大圆帽歪戴在头上,活像一只灯泡粘在另一只上。他走起路来,眼睛总是向前直瞪,仿佛在游行;当他想盯住街上某人时,先必须挪动屁股,然后全身才能动起来。

这样粗鲁蠢笨的人却能卖身为荣,在青年中称王称霸,成为爱尔兰的骑士。他瞧不起爱尔兰母语,“当他把这些谈话告诉别人时,就像佛罗伦萨人的习惯那样,把他名字的首字母 K 读成 H”。为了压制爱尔兰语,1560 年玛丽女王通过了《信仰划一法案》(The Act of Uniformity),规定“在每个教堂或地方,祈祷牧师都必须用英语,由于懂英语的人为数不多,规定可以用拉丁语代替,但不能用全体爱尔兰讲的、大多数老一代英国人也知晓的爱尔兰语”^[14]。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语言寓所中。”^[15]法农说:“说话,就是能够运用某种句法,掌握这种或那种语言的词法,但尤其是承担一种文化,担负起一种文明。”^[16]钱冠连提出:“一个文明的分崩离析是从语言被消灭开始的,维护母语对于维护一个文明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17]科利对民族语言的蔑视,也是对爱尔兰文化的蔑视。他模仿大陆语言,暴露了语言符号暴力的本质:“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转而以一种变相的形式表现出来。”^[18]

科利身着军服,象征殖民者的占领^[19]。小说描写他时大量运用军事词汇,如“他那茁壮的身躯大摇大摆,逼得(execute)伙伴在小径和马路间跳来蹦去”。“execute”还有“处决”的意思,象征他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镇压。再如,“他那魁梧的体态、潇洒的步伐,以及皮靴践踏的橐橐声,都使他显得像一个征服者(conqueror)。”此句形象地描绘了占领军的耀武扬威和残酷无情。他是殖民者收买的市井流氓,借外国强势文化来包装自己,挟洋自利,作威作福,招摇撞骗。他与姑娘交往时不仅占有她的身体,榨取她的钱财,还唆使她偷窃。偷来钱后他可以狐朋狗友下酒馆,再去诱骗别的姑娘。殖民地的财富造就了殖民宗主国的文明。诱使女仆偷金币象征了殖民者的目的:榨取殖民地人民的大量财富,以供殖民者的挥霍与享乐。法农说:“欧洲的富裕与进步是建立在黑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及黄种人的血泪尸骨上的,……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不断地从拉丁美洲、中国、非洲等地输入钻石与石油,丝绸与棉花、木头和许许多多的奇珍异宝。欧洲真的是第三世界的所创造出来的”^{[9]96-102}。

二、中层市民社会的主动赞同

葛兰西认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领导权,绝不只通过强制暴力来使被统治阶级服从,统治者还通过教会、学校、工会等社会团体,以文化、宗教、习惯、教育等为媒介,在智力与道德上说服被统治阶级,借以唤起后者“主动赞同”(active consent)统治者的领导及其权威。“采取各种平衡形式的强力与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强力过于显然地压倒同意;相反,甚至企图达到表面上好像强力是依靠了大多数人的同意。”^{[5]197-198}“市民社会”以内在无形的教化规范被统治阶级,与“政治社会”机制交互运用,统治阶级与从属阶级的利益互相结合成集体意识(collective will),使文化霸权变成一种催眠或麻醉的力量,诱导被统治阶级相信当前统治者的权力架构及体制现状为一种毋庸置疑的“自然现象”(the naturalness of its situation)^[20]。

殖民地本土知识分子(native intellectual)莱内汉属于葛兰西所谓的“市民社会”成员及法农所谓的殖民地中产阶级(national bourgeoisie),是社会的中层。“殖民地的中产阶级认同的对象是殖民宗主国的中产阶级”,尤其是他们“纵情享乐的精神”^{[10]153},因为后者是寻欢作乐的伙伴,他们也可以因依

附于后者而向同胞炫耀。但是,这种友谊是建立在短暂的感官享乐及空幻的殖民虚荣之上的,并非患难之交。小说中莱内汉“长得结实,脸色红润,后脑上歪戴着一顶驾驶快艇用的便帽”,伶牙俐齿,逗乐搞笑,朋友们都比不上,“肚子里装满了打油诗、谜语,以及许多乱七八糟的故事”。其实他是天生的吟游诗人(bard)。吟游诗人原指在凯尔特人中写作颂词和讽刺作品的人,推而广之,泛指部族中擅长创作和吟咏英雄及其业绩诗歌的诗人和歌手。早在1世纪,拉丁作家卢卡努斯就把吟游诗人说成是高卢或不列颠的民族诗人或歌手。这种习俗在高卢逐渐消失,但在爱尔兰、威尔士都保存了下来。爱尔兰的吟游诗人通过咏唱保存了民族文化和传统。1536年代总督格雷勋爵主持召开了宗教改革议会,规定不准供养爱尔兰弹唱诗人、“打油诗人”和行吟诗人,企图从文化上压制爱尔兰人。

莱内汉本应有个好前景,但在宗主国的经济盘剥下,民族工业衰落,就业机会稀少,因此他只能四处游荡。凡是有利可图的职位都被新教徒拿走。丹尼斯·斯库里在《爱尔兰惩治法典》中记载:“新教的面包师,枪炮制造商,锡匠,啤酒酿造商,建筑工,抄写员,杂货零售商都可以找到发家致富的途径。”^{[21]316}新教徒享受着种种特权,而天主教徒面对的是重重束缚。“对于那些居住在英国的新教徒而言,很容易便会相信爱尔兰的每个天主教徒,无论财产多寡、地位高低,都是清一色的叛乱者,应该穷困潦倒,应该沦为阶下之囚。”^{[21]318}没有职业和经济来源的莱内汉面容憔悴,困顿挨日。“当朋友们在酒吧聚会时他会大胆地闯到他们身边,机灵地呆在一旁。直到那些酒肉朋友请他人伙,喝一轮为止,……谁也说不上他怎么挨过这样困顿的日子”,他因此被称为“吸血鬼”。

象征着爱尔兰中产阶级的莱内汉们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呈现麻痹状态:没有自信,缺乏理想,空有一副好皮囊,只用来献媚打趣赚酒喝。殖民建构是双向的,它由殖民者自上而下的统治压迫及被殖民者自下而上的主动迎合互相作用而成。建构过程中,殖民地本土的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的中产阶级不顾民族大义,只企求在殖民统治的迎拒之间,谋取一点蝇头小利。莱内汉对科利的迎合和奉承,代表着爱尔兰面对代表殖民入侵势力所表现出来的自卑,夹杂着羡慕景仰的复杂情绪。极端贫穷的他只能避开熟人,溜进街边小店,要了一盘炒豆子和一瓶啤酒。豆子指涉《圣经》里以撒和雅各的故事。以撒为一碗豆汤而出卖了长子继承权,这里爱尔兰人就像以撒,为了眼前一己私利不惜出卖国家。

殖民主义压迫下的莱内汉和其他爱尔兰知识分子一样内心世界充满了矛盾。在爱尔兰文化长期遭到英国文化严重侵蚀的语境下,爱尔兰知识分子身心疲惫,时刻感受到自我身份迷茫、失去尊严、价值观混乱的深刻痛苦,他们的心灵在民族主义情结与为现实生存的“权宜之计”之间不断徘徊游移。他们既肩负着传承民族历史和传播民族文化的重任,又不得不寻求和殖民者维持、修好关系。这种处境下的知识分子情绪十分复杂,因此自卑、羞耻、焦虑成为他们的心理常态。独自游荡中,他在忏悔:

他一直四处漂泊,整日里囊中羞涩,耍手腕,搞诡计,实在厌倦了。到十一月他就三十一岁了。他就永远找不到好差事吗?就永远没有自己的家?他想,要是能坐在暖烘烘的火炉旁,吃上份像样的饭,那该多好啊!他同哥儿们和姐儿们在街上逛够了。他很明白,那是些什么哥儿们。他也深知那些女人的底细。生活的磨炼早已使他愤世嫉俗。

这里莱内汉表现出一种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既相吸引又相排斥,时而同谋时而抵抗的复杂混合心态。殖民主义权力结构中的爱尔兰知识分子由于主权被剥夺的打击而丧失了文化的主体性,无民族意识、非政治意义的求生本能使它变身为刺激外来者欲望的依附性存在,体现出混沌、迷惘、亢奋、伤感、自卑性格交织的文化变态的表征。莱内汉不是特例,路上遇到的几个年轻人都和他一样无聊空虚,谈话内容不是上酒吧就是打弹子,“朋友们谈得很少。他们漫不经心地望着人群中一些人,间或品头论足”。

英国八百年的殖民统治对爱尔兰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殖民霸权软硬兼施的统治下,爱尔兰人经过长期模仿/内化(mimic/internalize)英国的思想、价值、文化、生活习俗,早已对民族文化、民族身份产生了自卑自轻的心理,而对强势文化产生了崇拜敬仰甚至于感激之情。这种扭曲的殖民认同深植人心,成为理所当然的共识。与科利相比,莱内汉具有某些自省意识,很多评论

家认为这是因为作者与后者有很多共同之处。那时乔伊斯和兄弟及其他同学常在都柏林游荡。兜里有钱时就喝酒,有时身后还跟着女孩子^{[2]52}。他和妻子诺拉也是在街头认识的。如果没离开爱尔兰,乔伊斯很可能会成为莱内汉这样一事无成、穷困潦倒的街头混混。

科利和莱内汉,一个社会上层,一个社会中层,一个扁平人物,一个立体人物,构成爱尔兰的两面。“他们这种奇特的关系构成乔伊斯作品的重要主题:斯蒂芬与马利根;山姆与商。”^[22]这种对位关系从多角度揭示了爱尔兰社会,深化了主题。

三、下层属下社会的无声奉献

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不仅仅产生了种族问题,还产生了阶级和性别问题。小说中“土著妇女”女仆是斯皮瓦克所谓的“属下”(the Subaltern),代表着被“知识暴力所标识的封闭地区的边缘(人们也可以说是沉默的、被压制而不出声的中心),处于文盲的农民、部族、城市亚无产阶级的最底层的男男女女们”^{[23]118}。她受到帝国主义“认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的影响,被诱导相信帝国主义的“君上的自我”观(sov^{er}ign self),同时,她还被父权暴力压迫,这也反映了罗马天主教统治下的社会问题。在双重暴力下,殖民地女性参与自我主体身份的建构,将自身变成一个“无声的他者”。

她身体健壮,容光焕发,胖乎乎的脸颊红喷喷的,一双蓝眼睛毫不羞涩。浑身是粗线条。她脸上长着一对大鼻孔,阔嘴巴。当她斜着眼送秋波时,便张开嘴,露出两只虎牙,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从外貌可以看出,她是被迫在都柏林打工的乡姑,是贫困农村的代表。1845年爱尔兰发生了土豆瘟疫,英国坐视不救,造成农村彻底破产,一百多万人饿死,数百万人逃往他地,人口至今仍无法恢复,文化和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计。女仆和《土》中的玛丽亚都因农村破产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城里谋生,被城市榨干了血汗。相对英国的雄性绰号“约翰牛”,爱尔兰的爱称是女性“爱琳”。女性与第三世界的乡土、家国存在换喻关系,因此女仆的堕落象征着爱尔兰的堕落。爱尔兰被看成妓女,“伺候着她的征服者与她那快乐的叛徒。她是受二者玩弄的母王八”^{[24]56}。快乐的叛徒科利、莱内汉在拥抱帝国的同时,把对殖民地的自卑转为对比自己更弱势同胞的自傲。他们对她的利用和剥削象征城市对乡村、殖民者对殖民地、男性对女性的盘剥。而女性似乎自愿受到盘剥,没有自己的主体性,成为被玩弄的傀儡,“在父权制与帝国主义之间、它的主体构成与客体形成之间,妇女的形象消失了”^{[23]154}。

女仆还代表爱尔兰的宗教麻痹,她所穿的蓝白色衣服与圣母玛丽亚衣服颜色一样,暗示了爱尔兰天主教。历史上天主教会为了效忠罗马教廷曾出卖国家,体现在爱尔兰主权问题和帕涅尔事件上。身为管家却偷家里钱给外人的女仆与卖国护教的爱尔兰天主教会具有可比性,正如作者在《尤利西斯》中指出的,麻痹的根源一半是来自殖民统治,另外一半来自宗教束缚,因为爱尔兰是“一仆二主”——“一个英国人,一个意大利人……大英帝国,还有神圣罗马教会”^{[24]638-645}。小说中竖琴师所唱爱国诗人汤马斯·莫尔的《菲奴娜之歌》与女仆具有互指关系。菲奴娜(Fionnuala)是爱尔兰传说中国王李尔(Lir)的独女,被后母变成天鹅,在河流海边流浪,九百年后,当基督教的钟声敲响时,她才能被解放。歌词^[25]显得凄切哀伤,痛斥了爱尔兰大众的麻痹昏睡,表现了独立和平的渴望,翻译如下:

在海水的咆哮中,莫伊河啊你显得如此寂静,微风吹不断你昏睡的长链,
李尔寂寞的女儿悲痛地低鸣,把她哀伤的故事告诉给夜星。
何时天鹅能在黑夜中收起翅膀,休息并唱出她死亡的悲音?
何时天穹奏出天籁之声,从这暴风骤雨的世界里召唤出我的魂灵?
悲伤啊,莫伊河,伴着寒冬海浪的哭声,命运让我长期痛苦地四处飘零;
至今爱琳还在黑暗的噩梦中沉睡,至今曙光还在天际线外徘徊。
何时太阳与和煦的春天降临,给我们的岛屿带来爱与和平?
何时天籁之声奏起,把我的灵魂召唤入云?

戴水手帽的女仆隐喻菲奴娜,前者像被英国殖民者施了魔法,在混沌麻痹下流浪,“就像竖琴,女仆也被‘陌生人的眼光’制服,被‘主人的手玩弄’,……在她身上,叶芝所推崇的农民品质被都柏林生活压力摧毁了。她认为科利是个骑士,属于另一个社会阶层,能把女孩带出南环路(South Circular)的人,科利也利用这种社会身份来剥削她”^[26]³³⁴。女仆不仅给他买车票和雪茄,还为他偷主人的钱。虽然他相貌丑陋,没告诉姑娘真实姓名,姑娘却认为他像上等人。她是理想化的凯尔特乡村女性的现实版,是英爱统治阶级的奴隶。在殖民者和教会的共同教唆下,她变得更加堕落,科利说,“现在她当了婊子。有一天夜里,我瞧见她跟两个家伙坐在汽车里,在伯爵路上兜风呐”。恩格斯认为:“由于一贯的压迫,人为地把他们变成一个完全堕落的民族,现在他们担负着一种恶名昭彰的职务,即以娼妓、临时雇工、姘头、窃贼、欺诈者、乞丐和流氓,供给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27]

相对于中产阶级对殖民地位的“自知之明”,爱尔兰属下阶级(Subaltern Irish)的“不知不觉”是另一种深重的殖民“麻痹”。女仆不是特例,小店的女招待,还有科利勾引的南市姑娘,都是“属下”。女招待邈邈无聊,以观察路过的食客消磨时间;南市姑娘为了一点物质享受不惜出卖身体。科利夸口说:“乘电车兜风,都是我买的票;或者带她们去听铜管乐,上剧场看戏,要不就买些巧克力、糖果什么的。我过去在她们身上花的钱可不少。”这里只能听到科利的夸夸其谈,被他玩弄过的女性都是沉默的,就像斯皮瓦克的结论——“属下不能说话”^[21]¹⁵⁷。

“在《都柏林人》中,《两骑士》标志着作者全面掌握一些技巧,而这些技巧成为英语小说发展的转折点。《两骑士》混合运用了‘卑琐的’(scrupulous detailed)现实主义和复杂的象征主义,这是《都柏林人》与《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成就的主要特点。”^[26]³³⁴ Godoy 认为,作者用陌生化手法颠覆了骑士准则、神秘小说准则,也颠覆了叙事传统,改变了读者期待^[28]。小说只叙述科利和莱内汉的对话,却省去科利和女仆的内容,给读者产生想象的空间,出人意料的结尾深化了主题:“科利……徐徐地摊开手掌,让他的门徒凝神细看。掌心里,一枚小小的金币在闪烁。”笔者曾论证过乔伊斯短篇小说开篇的现代性^[29],其实《两骑士》也是这样的现代小说。

《两骑士》作为成年篇的最后一篇,意象丰富,多重意象并置:科利毫不在乎地玩弄姑娘——街头竖琴师漫不经心玩弄竖琴——莱内汉下意识手指沿着铁栏栅移动,这三者被共同的“玩弄”主题联系在一起。政治社会(科利)——市民社会(莱内汉)——属下阶级(女仆)所构成的阶级等级阶梯被金钱联系在一起。这样揭示了英国对殖民地的霸权统治、经济剥削、文化侵略和爱尔兰城乡在殖民统治下的堕落,强化了都柏林人的黑暗面,反映都柏林生活的多面性:首先是殖民者通过收买和诱惑控制爱尔兰的政治社会。其次是爱尔兰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种政策的腐蚀下,迎合英国的外来政权,热衷进行“英国化”(Anglicization)的自我改造,盲目崇拜外国文化,养成扭曲的“殖民虚荣”(colonial vanity),对本民族里弱势阶层(subaltern)进行内部殖民(internal colonization)的统治。最后是揭示爱尔兰属下阶层衷心仰慕外国文明,积极认同英国的殖民霸业,呈现出乐意被奴役、被剥削的“麻痹”状态。小说特别批判了混迹于城市年轻人的堕落,他们奉行拜金主义,追逐个人利益,只为钱和女人游荡。同时,小说也指出,爱尔兰乡村大众积极认同英国的殖民霸业并心存感激,乐意接受帝国的霸权领导。这种扭曲的殖民认同深植人心,成为理所当然的共识,这种殖民共识正是造成爱尔兰人“麻痹”的根源,也是殖民地人民最大的悲哀,他们的主体意识被收买腐蚀,丧失了自省的能力,不能看清殖民宰割的真面目。揭露这种真相,正是作者写作《都柏林人》的目的:“为我国写一章的道德史”^[30]。

参考文献:

- [1] Joyce J. Letters of James Joyce[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6.
- [2] Jackson J W, McGinley B. James Joyce's *Dubliners* [M]. London: Sinclair-Stevenson, 1993.

(下转封三)

(上接第 108 页)

- [3] Walzl F L. Symbolism in Joyce's *Two gallants*[J]. *James Joyce Quarterly*,1965 (2): 73-81.
- [4] Day R A. Joyce's gnomens, Lenehan, the persistence of the image[J]. *Novels; A Forum on Fiction*,1980,14: 5-19.
- [5] 葛兰西. 狱中札记[M]. 葆煦,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6] Hall S. Gramsci's relevance for the study of race and ethnicity[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1986,10: 5-27.
- [7] Joyce J. *Two gallants*[M]// Joyce J. *Dubliners*. London: Penguin Books,1996: 52-65.
- [8] Manganiello D. Joyce's politics[M]. London: Routledge,1980.
- [9] Fanon F.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M]. Farrington C,trans. New York: Grove Press,1968.
- [10] 乔伊斯 J. 都柏林人[M]. 孙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49-62.
- [11] Brownson O A. The "reformation in Ireland"[J]. *Brownson's Quarterly Review*,1852,4: 329-340.
- [12] Savage J. Fenian heroes and martyrs[M]. Boston: Patrick Donahoe,1869.
- [13] Wollaeger M. Bloom's coronation and the subjection of the subject[J]. *James Joyce Quarterly*,1991,28: 799-808.
- [14] Murray R. Ireland and her church[M]. London: Nabu Press,1845.
- [15] 海德格尔. 路标[M].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16] 法农. 黑皮肤,白面具[M]. 万冰,译. 北京:译林出版社,2005.
- [17] 钱冠连. 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18] 布尔迪厄 P,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M]. 李猛,李康,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 [19] Williams T L. Ideology in Joyce's *Dubliners*[M]// Andrew Thacker. *Dubliner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6.
- [20] Duffy E. The subaltern Ulysse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
- [21] Lee N. The catholic question in Ireland,1762-1829[M]. Bristol: Thommes Press,2000.
- [22] Tindall W Y. A reader's guide to James Joyce[M].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5.
- [23] 罗钢,刘象愚.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 陈永同,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24] 乔伊斯 J. 尤里西斯[M]. 萧乾,文洁若,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
- [25] Moore T. Melodies[M]. Philadelphia: T. Jekyll,1821: 41-42.
- [26] Scholes R, Walton L A. James Joyce, *Dubliners*[M]. New York: Penguin Books,1996.
- [2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殖民地及民族问题的论著[M]. 民族问题译丛编译室,译.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6.
- [28] Godoy H. Ungallant gallantry[J]. *Sig6tica*,1993,5: 57-62.
- [29] 王莘,张建颖. 论《姐妹们》的现代主义文学特征[J]. *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0(4): 71-77.
- [30] Joyce J. Selected letters of James Joyce[M]// Richard Ellmann. London: Faber and Faber,1975.

[责任编辑:黄燕]

Reading *Two Gallants* in Post-colonial Context

WANG Ping, ZHANG Jian-ying, YAO Dan-shu

Abstract: James Joyce considered *Two Gallants* to be one of the best stories in *Dubliners*, but the story had dimensions that have not yet been fully realized. In application of theories of Gramsci's hegemony, Fanon's and Spivak's post colonialism, it hopes to disclose how British colonizers keep domination of power by a combination of "political coercion" and "active consent" from three classes, i. e. the upper, the middle and the subaltern. Thus the values of the colonizers became "common sense" values of all, a consensus culture developed in which the subordinated Dubliners identified themselves with the colonizers, and helped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rather than revolting.

Key Words: Joyce; *Two Gallants*; post colonialism; Gramsci's hegemony; *Dubliners*